

晚清湖湘经世学风的兴起与演变

王国宇¹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嘉道年间兴起的晚清湖湘经世学风大体终结于光绪年间。在此过程中倡导经世学风的湖湘士子、学人,不仅从传统学术文化中阐释“通经致用”的重要性,更注重发掘其“微言大义”,强调躬行践履,而且随着民族危亡的加深,他们亦从西学中吸取养料丰富其学术思想以求为现实服务。这一学风的兴起与演变从一侧面反映了晚清中国学术演变的理路,推动了近代湖湘乃至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并以其深沉的思想张力,催生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兴起,激发了国人的奋斗精神、爱国热情和气节意识,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向。

【关键词】晚清 湖湘经世学风 演变 影响

经世即关注世事、治理国家,是传统儒学入世观的体现。湖南自南宋“湖湘学派”产生以来,这一旨在“务以经世”“康济时艰”的学风虽被长期压抑,但一直被具有经世情怀的学人所传承。至晚清嘉道以来,伴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和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管制的放松,这一积极入世的进取学风在湖湘再度兴盛,并与当时全国经世学风合流发展成为一种近代中国前期的主流学风,影响深远。

一

兴起于嘉道年间的湖湘经世学风,大体终结于光绪年间。其发展、演变过程,也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倡导经世学术的湖湘士子、学人,不仅从传统学术文化中寻找思想依据,从学理上阐释、论证经世学术思想的重要性,而且随着民族危亡的加深,他们亦从西学中吸取养料丰富其学术理论。这一学风的演进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嘉道年间湖湘经世学风的兴起

嘉道年间,湖湘士大夫中出现了一批提倡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经世士人、学者,陶澍、贺长龄、魏源、唐鉴等是其代表人物,他们对学术经世的倡导与践履,标志着晚清湖湘经世学风的兴起。

其时,陶澍先任江苏巡抚,后任两江总督,贺长龄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魏源是其幕僚。陶氏少负经世之志,尤重史志舆地之学,从政以后,注重经世之学,关心国计民生,提倡“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为封疆大吏之后,他身体力行,致力于遭运、盐政、河工等大政,践履了自己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经世夙愿,使之成为嘉道之际最重要的经世派代表人物。清末清流派代表张佩纶认为,陶澍是道光以降经世人才的源头,犹如“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①。

贺长龄和魏源均深受陶澍经世思想的影响,并成为其思想的积极阐发者和鼓吹者。道光20年(1840),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委托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120卷。魏氏在代贺氏所作序中,明确提出旨在通过此书改变乾嘉以来学者群趋于汉学(考据学)这种纯学术研究的学风,让经学为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服务。他说:“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

¹作者简介:王国宇,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湖湘经世学术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5BZS125)。

章，须考屡朝之方策”^②。他将该书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8类65目，以便人们检阅。该书刻印后，影响极大，此后数十年，《皇朝经世文编续编》《三编》《四编》《新编》《统编》相继问世。清末学者俞樾评价此书说，“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③。可见，该书的刊行，对当时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具有开风气的先导作用。而就他们共同的学术特征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通经致用。所谓经学，即传统儒家所推崇的经典。他们认为，经中含有致治之理，为人、为学均宜先尊经，“经者，常也。圣贤之言，如天地之常道，范围而不过，曲成而不遗”^④。“惟天下至诚，能经纶天下之大经”^⑤。治学之人不尊经读经是“舍本务末，苟以炫俗”^⑥。陶澍认为，士人要在尊经、通经的基础上用经。他认为国家科举取士之目的是为了选取通经致用的人才，“国家人文化成，因明制立书院，岁选高材之士，肄业其中”之目的也是为“储他日通今古之用”^⑦的人才。第二，批判“汉学”。他们从学理上对当时占着主流地位的汉学展开了激烈的批评。魏源针对皓首穷经的汉学者批判道，“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⑧，并提出了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体的治学思想，明确提出学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需求。陶澍则批评当时的治易者，相寻于虚，认为“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⑨之见解。认为我辈读书非关身心性命，即系天下国家，余可概置弗阅。第三，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亲自参与抗英斗争的魏源，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即编成《海国图志》50卷。魏源在此书中明确指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⑩。并说，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这样，魏源在经世思想指引下，不仅为国人提出了应对西方侵略的一个基本方略，同时为晚清的学术走向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嘉道年间湖湘士大夫中兴起的经世学风，虽贡献者甚多，但以陶澍贡献最大，孟森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名著《明清史讲义》中论及陶澍时说：“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⑪所谓“以学问为实行”，就是坚持经世致用的学风。孟森先生的这一评价是公正准确的。

（二）第二阶段：咸同年湖湘理学群体的经世学风

嘉道年间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人所倡导的理学经世学风，直接被咸同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刘蓉、郭嵩焘、彭玉麟等湖湘理学群体所传承，并在此基础上演化出其不同于前者的学术特色。

其一，以义理阐释经世。曾国藩特别强调理学的修身工夫，试图通过理学修养而“存诚”“明诚”，造就一批笃实之人才以挽救时势和清明社会风气。左宗棠也认为，“多读经书，博其义理之趣，多看经世之书，求诸事物之理”^①，先以义理正其心，继以经济廊其志，前者是为人之本，所谓救世必先正心救人，后者是用，“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②等均为救世之方法手段。

其二，主张“汉宋”调和。由于秉承经世的学风，曾国藩提倡“汉宋”兼采的学风，认为汉宋之争无学理上的根据，只是

^②①张佩纶：《涧于日记·己卯》第1册，丰润涧于草堂石印，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6年版，第31—32页。

②《魏源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2页。

③俞樾：《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序》，光绪二十三年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

④《陶文毅公全集》卷37《尊经书院课艺序》。

⑤《陶文毅公全集》卷33《沅江县尊经阁记》。

⑥《陶文毅公全集》卷50《苏州紫阳正谊两书院告示》。

⑦《陶文毅公全集》卷37《钟山书院课艺序》。

⑧《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9页。

⑨《陶澍集》（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99页。

⑩《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

⑪孟森：《明清史讲义》（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8页。

名异而实同。如他认为,汉学的“实事求是”注重文本考释,考求典章制度,其实就是宋学的“即物穷理”^③。因此他认为“汉宋”门户之争无益于学术发展,唯有以汉学的训诂补宋学的义理,使二者各得其所。

汉宋之争贯穿于晚清,曾有章学诚等人试图调和,并提出了“汉学出于宋学”的观点,但并未成功。曾国藩“另辟蹊径”,提出以“礼学”兼有内外两个方面,“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④。曾氏的“礼”通于道德和政事,自然也就可以连接汉宋之学。曾国藩的“礼学”不仅包含文字训诂,“三礼之学”的《仪礼》《礼记》《周礼》,甚至《通典》《文献统考》这类“政典”也归入其中,实际上包罗甚广。曾国藩以“礼学”思想来连结汉宋学术,实际上是想将传统的理学改造、熔铸为“经世之学”,为其治世的政治目的服务,但也为晚清学术的演变开辟了新境界。因此,有学者认为,其学术思想“体大思精”^⑤,“秩出于汉宋二学以外之别一学术境界”^⑥。

曾国藩在古文方面自觉地继承桐城派,并且在桐城派的基础上有所发挥,从而形成了桐城一湘乡派,在全国也有相当影响。而曾氏在桐城派基础上所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的“为文之方”加上“经济”而变成“为学之术”,即变经术为治术,使人们在践行经世时,能够有所持循,对晚清湖湘学风影响深远。

罗泽南、刘蓉的理学经世思想虽各有特色,有所谓“正学”“俗学”之辨,但都属于理学这一脉,只是从不同的层面与视角,阐释理学的经世致用功效,并未超出曾氏所言的“今日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⑦“君子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⑧的理学经世思想范围。

其三,对西学持开明态度。咸同湖湘理学群体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大体都是持比较开明的肯定态度,不过他们多是从技艺层面来理解并接纳的。曾国藩认为,“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⑨。左宗棠也说,“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但“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⑩,国人应求实学习西洋长技。郭嵩焘则更为先进开放,明确提出:“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⑪管郭氏这种比较激进的思想使其生前遭受众多攻击,但是在他逝世仅4年之后,谭嗣同在1895年所写的《浏阳兴算学记》就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⑫。杨毓麟则在其1902年发表的《新湖南》中在谈到“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时说:“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⑬

(三)第三阶段:光绪年间湖湘改良派的经世学风

咸同年间的湖湘理学群体,多是一批重践行致用的军政人物,他们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与国内各地起义军后,积极参与洋务实践,并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但标榜“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并未拯救时难,甲午战败宣告了“中体西用”这一

^③①《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1987版,第88页。

②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叙》《四部备要·子部》,中华书局1912年版,第3页。

③《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版,第166页。

④《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版,第358页。

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中华书局1986版,第587页。

⑥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页。

⑦《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4页。

⑧《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9页。

⑨《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272页。

⑩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27页。

⑪《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5—347页。

洋务指导思想的破产。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为寻找新的救时理论，首先在学术思想领域开启了新的道路，并由此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受康氏“托古改制”思想的影响，谭嗣同以春秋公羊三世说和进化论为武器，向传统专制思想宣战，为维新变法鸣锣开道，在此背景下，湖湘以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等为代表的维新派经世思想应时而生，并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

首先，他们以今文经学为理论武器。以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湖湘维新派治经之目的不是为了纯粹的学问，而是为了致用，即所谓“通经所以致用，汉人治经，皆切于时用，故经学莫盛于汉”^①。他们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因而对空洞说教的宋学和重考据的汉学均持批判态度，认为国人治学“大病在一空字”，“本汉人治经之法，求汉人致用之方，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②。

因通经是为了致用，他们因而对今文经学的“变”极为推崇。谭嗣同认为，孔子见三代以后君权日盛，民权日衰，才惧而作《春秋》，以倡导改制，兴民权。唐才常甚至说，《春秋》为改制之书，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治通三流，礼存四代，它与近代公法之理相通。皮锡瑞也认为，“《春秋》一经为圣人经世之书，更须先通大义微言，方知孔子创教，实有素王改制之事”^③。这样，他们从今文经学入手，表面在研究经学，实则在积极为其维新变法寻找理论依据。

其次，明确以“变法”为经世之目的。以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湖湘维新派，对于自己利用传统经世思想来变革现实之目的毫不隐瞒、躲闪，而且明确向世人宣示其学术为现实服务的指向。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系统地阐述了其经世变法思想与主张。皮锡瑞认为，自变者昌，代变者亡。王先谦在维新运动初期便呼吁“力图自强”。而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他们冲破了今文经学的藩篱，不满足于阐释儒学的微言大义，而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主张，这实际上便突破了传统经世思想的束缚与“中体西用”思想的藩篱，一方面达到了传统经世思想无法达到的高峰，另一方面也宣告了传统经世学术思想做为变革现实的外衣的历史终结，尽管这一任务最终是由在此后勃起的民主革命派来完成的。

二

晚清湖湘的经世学风是近代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一种学术思潮。在此社会背景下，一批开明封建士人和具有进步倾向的学者为挽救时局，首先从传统学术思想中寻求根据，隐晦地表达自己的经世主张，进而演变为从西学中寻找自己的思想武装为变革现实服务。这一演变过程，实质上就是传统学术思想不断吸收西学的思想文化，在交融中形成一种新的学术文化的过程，是晚清湖湘学术转型的体现，并构成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一翼。我们仅从晚清湖湘今文经学的演变与史学的发展便可较清晰地体认到这一演变理路。

（一）从晚清湖湘今文经学的演变来看

晚清湖湘今文经学的发展涉及众多经学人物，魏源、王闿运、皮锡瑞、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具有代表性。我们从他们今文经学思想的演变轨迹，便可窥见晚清湖湘学术转型的基本脉络。

清代今文经学是在嘉庆以后汉学开始衰落而兴起的，湖湘的首倡者魏源受学于“常州学派”的刘逢禄，与龚自珍同为当时今文经学大家，但龚氏在今文经学方面的研究不出《春秋公羊传》，魏源则将今文经学研究范围由《春秋公羊传》扩大到《诗经》《尚书》等典籍，由此大大扩大了今文经学在晚清学术思想上的影响。魏源对今文经学的最大贡献是主张“通经致用”，

^①《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3—174页。

^②《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5页。

^③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戊戌年八月初七日。

^④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页。

^⑤皮锡瑞：《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八次讲义》，《湘报》第35号。

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用训诂的考据学方法研究经学，力主以复古之名行变革之实，他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典章制度，比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做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①魏氏认为乾嘉汉学试图恢复东汉许慎、郑玄等人古文经学，虽在学术上有进步，但更重要的是要使经学能够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这实际上是他“以经术为治术”的学术理路的体现，是其“通经致用”观下谋求改变学术方向，倡导经世之学，进而为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体现。魏源的这种治学理路，此后数十年间一直被经世学者所传承、光大，为近代西学的传播具有扫除思想障碍的开路作用。

被称为“晚清诸儒之冠”的王闿运，以“公羊学”的义理思想通注群经，对晚清今文经学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王氏注重区分经和史，主张“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②。即认为经学的功能在于正人心而救风俗，史学则以资政救时为目的。这种由内圣而外王的经学思想虽倾向于今文经学，但与魏源、龚自珍的“通经致用”学术思想存在明显不同，因魏、龚几乎是直接将经学阐释为经时济世之学。

王氏的经学思想直接影响了他的四川弟子廖平。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古今兼采”“尊今抑古”的思想，对康有为“旧瓶装新酒”、会融中西学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影响甚大，也使王氏的今文经学思想由湖南传播到四川、广东。

皮锡瑞治经持论平允，偏重学术研究，被称为晚清今文经学中的“经生派”，不同于康有为等人以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政论派”，但他也认同“崇今抑古”的今文经学主张，并在维新运动期间明确站在康有为等人的今文经学派一边，认同《新学伪经考》的价值，并说：“康门诸君言学派通于政事，不得谓之无本末，昧者何以诋之。”^③皮氏治经虽与康氏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有所不同，但他“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④的治经指向是与维新派一致的，并在湘、赣两省产生重要影响。

这种中西学交融在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身上，体现得十分突出。谭氏对今文经学有自己的理解，但对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却有所接受，这如同当时梁启超受康氏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一样。谭氏自称为康氏的“私淑弟子”，实则是指其维新的某些思想受康氏“三世说”“孔子改制说”思想的影响，并成为其冲决封建专制思想罗网的武器。他在《仁学》中多次提到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批判后儒不知孔学精义，能言“据乱世”的专制制度，而不能言“升平世”和“太平世”的平等制度，所谓“孔虽当据乱之世，而黜古学，改今制，托词寄义于升平、太平，未尝不三致意焉。今第观其据之雅言，既不足以尽孔教矣。况其学数传而绝，乃并至粗极浅者，亦为荀学掺杂，而变本加厉，胥失其真乎”^⑤。谭氏实际上是以恢复孔学“精义”为由，宣传其西学思想，为维新变法扫除思想障碍。

唐才常在两湖书院期间就开始倾向于今文经学，并在书院课卷中有所体现。但他在湖南新政期间大谈“素王改制”，实际上是对康氏经学观点的认同。他利用今文经学批判传统政治与学术，阐述西学的先进思想，使他与谭嗣同、康有为等一样，都是以今文经学为外衣，大肆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晚清湖湘今文经学运动增添了崭新的时代内容。

这样，在经世学术思想的导引下，晚清湖湘今文经学经魏源等以经术通于政论，中经王闿运弟子廖平传至四川，远播广东，经康有为经学的大胆创新，并经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众维新志士的宣传，成为了维新运动的理论武器，使西学的思想、观念大行于世，也使中、西学的融合向前大大跨出了一步。这一曲折、隐晦的晚清湖湘今文经学交融、演变过程，也反映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理路。

^①①《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2页。

^②②王闿运：《湘绮楼文集·湘军志》，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14页。

^③③《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37页。

^④④陈寅恪：《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7页。

^⑤⑤《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5页。

（二）从晚清湖湘史学的发展来看

“以史经世”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功能和突出特征，也是晚清湖湘经世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晚清湖湘士人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刺激下，在利用史学这一独特的经世工具为现实服务时，不仅高举传统爱国御侮这一思想旗帜，而且伴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大胆吸收西学中的进化史观来审视历史，同时开创性地研究外国史地，以图达到经世救时的目的。

一是以史经世，宣传爱国御侮思想。亲自参加过抗英斗争的魏源，在鸦片战争后，发奋著《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以史述其志。《圣武记》通过罗列清前期的赫赫武功，总结其经验，以激发国人抗击强敌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勇气，并指出：“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岛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⑥在《征抚记》一书中，魏源对抗敌动摇不定的“和议派”予以无情的揭露批判，对林则徐、邓廷桢等爱国官兵英勇抗敌事迹予以热情讴歌，针对敌人的船坚炮利，提出了创办船厂，将“西洋长技”转“中国长技”的先进思想。其时，英人宾汉著有《英军在华作战记》将战争责任推给清王朝，为其侵略张目，国内黄恩彤著有《道光抚远记略》，为“议和派”粉饰，在此情况下，魏源以史实批驳“禁烟启衅论”，歌颂主战派和民众自发的抗英斗争，抒发了其爱国御侮的史学思想，成为近代史学爱国主义思想的先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边患日益增多，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于是一些湖湘士大夫为此开始注意边疆史地的研究，郭嵩焘的《绥边征实》、黄沛翘的《西藏图考》，均是以史经世之书，表达出他们强烈的自强史观和近代爱国御侮思想。

二是以进化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在“以史经世”思想的指导下，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一些先进的湘人在寻求新知时，逐渐接受了西方的进化史观，并以此诠释中国历史，试图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理论依据。尤其是《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和《英民史略》等西方历史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为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接受西方的进化史观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谭嗣同不仅肯定了世界万物都处于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日新”过程中，天地的“日新”就是历史的延续和进化，而且他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逆三世”到“顺三世”的顺序发展演变而来。即从太平世、升平世到据乱世，再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太平世。认为自孔子之时到晚清，社会仍处于“据乱世”之中，但将来必然向升平世、太平世发展，这种发展不是人类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种未必精当的进化史观，是当时中西学融合、转型的普遍特性。

三是开创性地研究外国史地。为了经世“攘夷”，鸦片战争后，湖湘学人从重研究本国史地开始主动转向研究外国史地，从而扩展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开辟了传统史学经世的新境界。魏源、郭嵩焘、曾纪泽、张自牧、王之春等便是湖湘学人的代表。

魏源受林则徐之托编撰的《海国图志》，因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内容涵盖近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国际关系等。魏氏“开始用近代眼光、近代观念，而不是仍完全或基本沿袭中世纪的眼光和观念，观察、介绍、评论近代世界的方方面面”^⑦。这就不仅丰富了国人对外国的认知，而且为晚清湖湘学术乃至近代中国学术的转型提供了新的理念指向。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日记》，则是以日记的形式，对西方的器物、史地、制度以及学术思想等进行诸多记述与介绍的著作，而且在书中融入了他们对西学的肯定态度。张自牧的《瀛海论》在记述美、日、英、俄等国史地的同时，与中国史事、洋务问题进行对比研究。王之春所编的《国朝柔远记》则较全面地记载了光绪以前的清代中外关系，特别是欧洲国家的侵华史，并对所涉国家的史地逐一介绍，具有传播西学的启蒙作用。此后，王先谦、易本羲则是在更深的层面展开了外国史地的研究。王氏著有《日本源流考》，编纂《外国通鉴》和《五洲地理志》，尤其是其《日本源流考》对明治维新做出的评价颇具创见。易氏的《南洋华侨史略》则是研究南洋华侨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总体而言，晚清湖湘学者在民族危亡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以经世救时为宗旨，关心外国史地的介绍、研究，重视西学知识的传播，是中国传统的史学经世思想在理论上取得新突破的重要标志。它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融，推动了晚清湖湘乃至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

^⑥①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6页。

三

晚清湖湘经世学风的兴起与演变，有着复杂的原因，它是晚清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在学术思想领域曲折、隐晦的反映，对湖湘乃至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向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

(一) 社会危机刺激封建士人立志匡时济世

清代经过康乾盛世后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清政府政治上积弊日深，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百姓日趋贫困。所谓“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②。而西方列强的加紧侵犯和掠夺，导致烟土泛滥，白银外流，更是加剧了这种灾难。正是这种深刻的社会危机迫使进步的湖湘士人思考民族国家的出路，探寻挽此颓势的救时良策。而当时学界主流的汉学繁称杂引，脱离现实，不得所用。“当天下无事时，文章尔雅，以之润色太平可矣。及其有事，欲以口耳之学，当天下之变，宜其束手无策。无他，知其小，不识其大也”^③。在此情形下，以经世为宗旨的今文经学与“师夷长技”学风也便应运而兴。此后，无论是湘军士人的“新理学”经世学风，还是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为代表的湖湘变法派融合中西的经世维新思想，无不是应时的产物。

(二) 湖湘传统经世思想的影响

在湖湘学术史上，南宋“湖湘学派”的出现是一件带标志性的事件，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湖湘开创的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学术志趣影响十分深远。胡安国殚精竭虑而著《春秋传》，以为“百王之法度，万世之绳准”^④，其为致用之书的意向十分明确。此后以经世为志趣的治学之风在湖南便绵延不绝，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时，形成为又一经世思想的高峰。王氏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上承湖湘学统，下启清代湘学源流，其一生所表达的将道统、治统和学统统一的精神追求与学问宗旨，是其经世学术思想的突出体现，并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在进入清代后，汉学逐渐在学术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但即使在这一时期，湖湘地区的经世学风仍然未曾中断。长沙岳麓书院的一些山长在穷经和考据的同时，其经世的学术意向仍闪烁可见。到了嘉道年间，随着清统治危机的加深，经世学术思潮便暗流涌动，并逐渐汇成一股主流的学术思想。

(三) 湘军士人的崛起促进了经世学风的传播

晚清湖湘地区的经世学风之所以在晚清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与以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等为代表的湘军士人集团的崛起有很大关系。从学理上而言，咸同年间曾国藩等湘军士人的学术志趣，与嘉道年间陶澍、贺长龄、魏源等的经世学术思想有着直接的理学传承关系。曾国藩等人只是将这种理学经世思想进一步改造，使其更具兼容性。由于曾国藩等人一方面虽然坚持理学的“义理观”，但同时努力践履“师夷长技”的西学思想，成为洋务自强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和推动者，从而使他们在统治集团获得了广泛认可。尤其是随着大批湘军将领分赴全国各地为官从政，并因务实的为政风格与不俗的实效而博取了清统治者的认可，使得他们倡导注重经世、躬行实践、汉宋兼采的理学经世思想播及全国，成为晚清学界的重要一脉，尤其在咸同年间，甚至可以说成为经学领域执牛耳的主流学术思想。

(四) 同时代外省经世士人的影响

一种学风的兴起与演变，往往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晚清湖湘经世学风的兴起与演变，也受同时代外省籍众多怀抱经邦济世之士思想的影响。

^①《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②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③张璠：《读至诗传》《知退斋稿》卷1，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④胡安国：《春秋传·序》，《春秋传》卷首，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页。

陶澍作为嘉道时期最为重要的经世人物，不仅将湘籍的魏源、贺长龄、黄冕等经世之士团结在一起，还结交大批外省经世之士，包世臣、林则徐、俞德渊、王凤生、陈鉴、姚莹等怀抱经世之士，均被陶氏所团结。讲求经世之学的包世臣，对河、盐、漕等大政均有研究，陶澍将其纳入幕僚，每遇经世大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慷慨言之”^①。经世能吏林则徐与陶澍早有交往，陶为江苏巡抚时，林为江宁布政使，陶为两江总督后，林任江苏巡抚，共事七年，彼此“志同道合，相得无间”^②。

后世以“龚魏”合称的龚自珍与魏源，均是嘉道经世学风的重要倡导者，且为“挚友”，在“变法”的历史观、学习西方长技，呼吁抵抗外国侵略者等诸多方面见解一致，龚氏逝世后，魏源为其校正遗著并作序。包世臣与魏经历相似，二人关系十分密切，书信不断，经世志趣相投。魏氏著经世著作《圣武记》请包氏“审定”，包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包氏编成《安吴四种》后亦请魏氏“定正”。包世臣比龚、魏年长，有学者甚至认为，包世臣的经世学风“下开龚、魏”^③，影响甚大。以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湖湘维新派的经世思想，则明显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经世维新思想的影响。谭氏说：“因宛转觅得《新学伪经考》读之，乃大叹服。以为扫除乾、嘉以来愚谬之士习，厥功伟；而发明二千年幽蓟之经学，其德宏。……后得交梁（启超）、麦（梦华）、韩（文举）、龙（泽厚）诸君，始备闻一切微言大义，竟与嗣同冥思者十同八九。”^④这一方面说明康、梁等人对谭氏的影响，同时说明湖南维新志士并不是盲目认同，而是有着自己的思考。

晚清湖湘的经世学风是在否认烦琐的汉学和空疏的宋学基础上兴起的一股学术思潮，它对湖湘人才群体的兴起，湖湘文化的兴盛，湖湘乃至近代中国历史的演进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湖南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人才相对不足，在全国诸行省中地位不高，由于经世学风的影响，自清代嘉道以来，湖南士子多关心国家命运，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积极投身到各种政治军事斗争之中，用自己的经世思想指导实际的行动，从而在近代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创造了显著的业绩，并形成了一批又一批人才群体。嘉道时期以陶澍、贺长龄、劳崇光、魏源等为代表的经世人才群体，咸同时期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等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体，维新运动时期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为代表的维新人才群体，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为代表的辛亥人才群体……均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特别是湘军人才群体的崛起尤引人瞩目。同治二年（1863年）张集馨说：“楚省之盛，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昌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松（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督、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①对于湖南人才因注重经世学风而兴盛，近代就有不少有远见的学者论及于此。比如，杨昌济指出，“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②。杨氏将近代湖南人才之盛归结为“学风所播”，可谓把握了根本。

伴随着湖南人才群体的兴起，湖湘文化也逐渐走向兴盛。由于一批湘籍士人、学者投身思想革新运动，引发了湖湘思想文化领域的激烈争鸣，促进了湖湘思想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大批具有强烈经世情怀的湘籍军政人物挤身历史舞台，不仅为湖湘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且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增长了他们的新知，使他们在与异域或他域文化的广泛接触中，创造出了具有某些新因素的文化，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同时，由于这些人才在事功上的巨大成就与影响，极大地激发了湖南人的务实奋斗精神、爱国热情和气节意识，日渐形成了一种自强不息的独立根性和讲忠讲义气节的血性。郭嵩焘说，他与湘军将领共事20余年，“已晓然知有名节之说，薄视人世功名富贵，而求所以自立。数十年出处进退，以及辞受取与，一皆准之以义，未尝稍自贬损，于人议论毁誉，一无所于其心”^③。这种重“名节”，以“忠义之气”“忠义血性”为准来匡正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在近代民族危亡之时极大地激发了湖南人的担当意识和爱国精神，影响十分深远。

钱基博在论及近百年湖湘学风时有言：“新旧相劘，问学殊途，而要之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

^①包世臣：《杨州府志·艺文类》，《安吴四种》卷8，光绪十四年木刻本。

^②《魏源全集》（下），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11页。

^③吴则虞、余滋兰：《包世臣的学术思想》，《光明日报》，1962年5月11日。

^④《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4—445页。

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志在于淑群，行不害违众，精神意趣，则无不同。”^④钱氏认为这就是湖湘的经世务实学风，并在晚清众多湖湘学人身上是一脉相承的。他还认为这些湖湘学人，“其人为天下士，为事亦天下事”，所以他“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⑤。从 20 世纪 40 年代钱氏的这些论说，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晚清湖湘经世学风的普遍价值和巨大意义。

^④①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7页。

②《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页。

③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养知书屋光绪十九年刻本，第34页。

④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页。

⑤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5 页。